

02298
5261-8818062



女史文選

第十二輯



文登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文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封面设计

焦占学
栾业礼

文登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文登市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人 物 传 记

中国的保尔——赛时礼组稿

我作“策反”工作始末……………赛时礼（2）

老八路赛时礼的传奇故事……………蒋延庆（25）

我与《三进山城》……………赛时礼（44）

令人钦敬的赛时礼……………安家正（53）

饱蘸热血写春秋

——访《三进山城》作者赛时礼……………薛 红（63）

我国显微外科开拓者——于仲嘉……………于文凯（69）

英 烈 千 秋

革命英烈——于化南……………徐文芳（86）

王长息朝鲜青山埋忠骨……………盛星辉（93）

史 海 钩 沉

一封珍贵的历史信件……………丛培学 王国泉（99）

钟声悠悠话沧桑……………毕西田 张玉强（104）

古城风貌

文登古城变迁记……………毕西田 王国泉 (106)

委员风采

独辟蹊径架金桥 一心为民铺富路

——记文登市政协委员、汪疃镇兽医站站长鞠远福

……………张元德 (118)

中国的保尔——赛时礼组稿

编者按：

赛时礼同志的一生，可歌可泣，光彩照人：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机智勇敢，威震敌胆，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和平建设时期，他身残志坚，奋斗不息，驰骋文坛，硕果累累……他当年的许多传奇故事仍被人们广泛传颂；他今日的高风亮节更为大家由衷钦敬。他的一生，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变奏曲。在革命人生的坐标上，他使生命发出了最大的光和热。他被人们誉为“中国的保尔”。

为教育今人，激励后代，现应大家的迫切要求，我们特从他一生事迹中选取几个侧面与片断，辑成这一《组稿》，以飨读者。

我作“策反”工作始末^①

赛 时 礼

(一)

1938年1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就奉“文登民众抗敌运动委员会”（简称“民动会”）的指示，在村中办“自卫团”，开始我任分队长，不久又任团长。

1938年7月，战斗在威海前线的三军三路^②，奉命西上蓬（莱）、黄（县）、掖（县）^③以后，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下令取消三军在各村办的“自卫团”，改为他们办的“保卫团”。当时，“民动会”指示各村自卫团长，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斗争策略。各村自卫团长，明里是保卫团长，暗里仍是自卫团长。其任务是动员青年西去参加三军^④扩大部队，等待时机，准备迎接我军东上抗日……

从此，“民动会”又命我负责动员全乡青年西上参加八路军（1938年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那天，胶东第三军改为八路军）的工作。

1939年8月3日，县委地下联络站站长于永泉告诉我：“县委指示，马上停止动员参军工作。”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

“7月28日，文登南乡有20多个青年西去参加八路

军，走到海阳县郭城镇，被顽军部队扣留，并强逼着编入顽军的部队。当时驻栖霞郝格庄的中共东海特委派人向驻郭城的顽军进行交涉，他们才允许被扣留的新兵原路返回文登，不准去参加八路军！”于永泉气愤地说：“在8月1日夜，顽军的便衣队杀害了八路军五支队驻文登葛家的联合办事处主任李慰川和5名工作同志，制造了‘葛家惨案’，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面目。因此，地下县委决定：命你以当兵为名，参加国民党顽军丛镜月的部队，作策反⑤工作。你对此工作有何意见，提出来我好转告县委。”当时，我表示坚决服从县委的决定。

时隔两月，敌工部长和我谈了作“策反”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及作敌军工作者要严格遵守纪律问题。接着，我到丛部招募新兵站报了名，被编入丛部⑥第七大队一连当了一名新兵。

新兵入伍后，先得进行单兵训练。我过去受了四个月的壮丁训练，所以我作的单人操练均合乎操典上的要求。

有一天（星期六）早晨，大队集中会操时，大队副王得福看完我走的步伐后，把我叫出队列，两眼盯着我问：“你叫啥名字？”

我立正说：“叫于林庭。”

王得福又问：“你过去当过兵吗？”

“我没当过兵。”我挺着胸膛说：“去年八月，我受过4个月的壮丁训练。”

这时，大队的杨怀生特派员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问：“你参加壮丁训练的教官是谁？”

“听说是县政府政训处派的，我记得叫邹文举。”

杨怀生再没吱声。

当时，我心想：杨怀生对我的盘问，证实了地下党对我说的，丛部各大队的特派员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我入伍才两个月，就提我为班副。因我经常唱几句京戏，不知谁告诉了韩宗信连长。有一个星期天，传令兵把我叫到连部，韩连长非要拉着胡琴，叫我唱几段京戏。我再三推辞，但他非叫我唱不可。于是，他拉着胡琴，我就唱了一段“空城计”，我又拉着弦他唱了一段“贺后骂殿”。他直夸奖我胡琴拉得音调好，又会包腔。当时我也吹捧他唱得好，比洋戏片上“程砚秋”唱得都好。他美滋滋地直笑。从此几乎每个星期天，韩连长都叫我拉着弦他唱几段程派、梅派戏。这样，不仅他和我加深了感情，而且为我开展“策反”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当了班副才一个月时间，就与和我相处最好的几个士兵拜了把兄弟，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半个班了。不久，班长患病到医院养病，又提我当了班长，这就使我名副其实地掌握了班里的大权。

有一个星期天，大队长的联络副官刘保山请我到小酒馆喝酒，祝贺我荣升班长。

刘副官经常到班里，以看新兵为名，和我啦一些家常，告诉怎样当好一名抗日救国的好兵，班长与兵之间，要和气相处，常言道：“和气生友情”。他虽然是大队长的副官，但我们俩的友情越来越深。

这次，我们俩在喝酒当中，他说了一些感人肺腑的话。他告诉我：“杨怀生是个笑面虎，内藏奸诈，你要紧睁眼，慢说话，切记‘言多有失’。别看班长官小，在关键时刻，

一个班能起到‘蝼蚁掘穴，毁坝决堤’的作用。拜把兄弟要防止坏人探听情况，上当受骗。”

刘保山说的这些话和我受训时敌工部长嘱咐我的话一样。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否尽说我爱听的话，试探我的实情呢？我想：“人心难测，还是小心为好。”

(二)

11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带着全班到“关帝庙”接换了3排9班的班哨。这座“关帝庙”在汪疿集正东4华里，处在威海、荣成、文登和汪疿集的十字路口上。不管鬼子从北边来，还是从东边来，都是必经的关卡，也是防守汪疿的前哨。

我从看庙老人口中得知：过去这座大庙，每年3月6日都赶庙会。自从“七·七”事变后，再也没赶庙会了。原来庙上有50多亩好地，也被官府没收了！五个看庙的道士因没有收入，也饿跑了。老人通过区公所的秘书，每月5元钱租下过去道士住的5间破草房，开了个小店，不过混碗饭吃而已。

当日中午，我查完了岗哨，刚走到小店街门口，看见老人在屋门口向我招手，我走进屋来，见联络员于永泉正就着猪头肉吃火烧。我欢喜地说：“二号（于永泉的代号）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于永泉笑着说，“我按照你说的地点找来的”。

我和于永泉兴高采烈地互相握手，落座后，他把老人和老人的儿子都叫进屋来，向我介绍了老人和所谓的他儿子的

身份。

老人叫周继圣（代号为“三号”），是地下党的联络站长，现在以看庙为名，实际上是文登二区地下联络组长，负责领导我军在丛部的“策反”工作。那位小伙子不是继圣同志的儿子，他叫江亮，是在继圣领导下，作联络员工作。末了，于永泉加重语气说：“从现在起，你工作归周继圣领导；江亮代号为‘五号’；还有敌工部要你加紧‘策反’工作，并想法搞一部分子弹和手榴弹，准备年关武装起义用。”

就在我接了班哨第二天，上午十时许，因天降大雪，有200多日本鬼子，在汪疃北边向汪疃北高地上打枪打炮。韩连长在电话中命令我在庙北的山上抵挡一阵，然后就向二龙山撤退。

我扣上电话心想：“今天我要下决心打个小胜仗。这样可以加深匡玉洲大队长和韩连长对我的信任，也可以提高我的威信。这对我作‘策反’工作是有帮助的。”

于是我带着士兵们迁回到敌人的左侧后方，把正在村里抢掠的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扔了抢的东西，仓皇而逃……

战斗结束后，我们从雪地里捡了200多发子弹；还听村里的老乡说，共打死一个鬼子，打伤三个鬼子。我回到庙上，把捡的200多发子弹交给了“三号”，让他想法送给敌工部；又命迟文正把消耗的子弹造册上报。

当日下午，大队长匡玉洲和韩宗信连长都打来电话祝贺一班的胜利。接着韩又叫我马上到连部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战后的第三天早晨，我正在庙前的公路上散步，大队部特务班吴子群班长骑着车来告诉我：“上午9时大队副王得福、杨怀生和刘保山一同到一班检查战斗消耗的子弹数目，保山估计其中必定有诈，要你仔细想想‘好花还得绿叶配’这句话的含义，沉着对付他们。”

我看着吴班长骑车而去的背影，心里琢磨着“好花还得绿叶配”的含义。是不是刘副官把我比作花，把他自己比作绿叶，暗地支持我，帮助我，使我转危为安。过去我能顺利当上班长，恐怕他在暗中也起了作用。从他过去对我的言行推测，他十有八九是我们的人，不过党纪规定，作敌军工作者，不许与任何人发生横的关系。从眼下情况看，俺俩不过是“心心相印”而已。

王得福和杨怀生突然来检查子弹消耗的数目，目的是乘匡大队长外出开会之际，用莫须有的罪名，从我身上打开缺口，把暗藏在丛部里的八路军挖出来，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高潮。

这时，门岗张希勤喊了一声：“他们来了。”

我把王、杨和保山迎接到大殿里，让他们落座在供桌两边。四个大兵就开始检查全班的子弹。检查的结果，按统计表的数目，其中有五人多出一发子弹。

王得福两眼盯着我：“于林庭，那五个人为什么多出一粒子弹？”

我坦然地说：“因为上峰有明确规定，士兵丢了子弹，就得按每粒一元钱补偿。所以我叫他们多留一粒子弹，准备万一掉了子弹好补上。这是我的错误，不该弟兄们的事。”

王得福又节外生枝地问：“前两天那次战斗，韩连长对

你下的什么命令？”

我理直气壮地说：“命我在庙北山上打几枪，就机动灵活地撤到二龙山待命。”

“你为什么不执行韩连长的命令，反而投机取巧，显示自己的才能？你看出那天大雪纷飞，就是朝天打枪，鬼子也得逃跑，但你却贪天之功，胡说你把敌人打跑了，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嘛！”王得福咬牙切齿地拍着桌子说：“这次战斗，你犯了不服从命令和虚报战功之罪。要按军法，严惩不贷！”

我看刘保山合上日记本，表示要发言的样子。于是，我就退一步说：“既然王大队副不相信一班打了胜仗，我也不分辨，等着调查清楚，我愿受处罚。”

这时，刘保山副官站起身来，向王得福鞠了一躬，心平气和地说：“王大队副，我是否能说几句话？”

王得福说：“我叫你来，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

“那次战斗，只有一班跟敌人打了一下，打伤三个，打死一个鬼子。当时虽然下雪，但大队长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你昨天才回来，恐怕韩连长还没来得及向你汇报啊！”说罢，向王得福鞠了一躬，表示对他的尊敬。

“刘副官说得对”，王得福顺水推舟地说，“等大队长回来再说。”

杨怀生也很不自然地说：“我同意王大队副的意见，为慎重起见，以后会调查清楚的。”

王得福性情急躁，一看问不出个头绪，就怒吼着：“于林庭，你昨天与别人合伙盗窃了大批子弹，卖给别的部队。你要从实招来，若是再耍花招，老子要打你一个‘皮肉

开花’，叫你一辈子爬不起来。”

杨怀生满脸阴沉地说：“不要怕得罪你上峰，自古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快说吧！免得皮肉受苦！”

我从王得福和杨怀生诬蔑我和别人合伙盗卖子弹的口气推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从雪地里捡了些子弹送给了敌工部，可能是韩宗信昨天下午叫我给郑部李营长送去的子弹的事被他们知道了，他们认为是昨天战斗后我多报了消耗子弹的数目，偷着把子弹卖给了郑部。所以，他们用敲山震虎的手段威逼我。

我毫不畏惧地说：“我没有和别人合伙盗卖子弹，让我说什么？”

王得福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摔，恶狠狠地大喊一声：“你还敢嘴硬。来，给我使劲打！”

“打”字刚一出口，四个大兵一拥而上，两个把我的胳膊扭朝后，按在地上跪着，另两个把皮鞭放在盛水的铜盆里一蘸，刚举起皮鞭要打时，我大声喊道：“大队副，我冤枉啊！我确实没有盗卖子弹。”

这时，刘副官走到王得福跟前耳语了一阵子，最后说：“这是20天以前，大队长叫韩连长找关系买一部分79子弹。他又托现在在郑部当营长的同学，从威海伪军手里买了200发子弹。后来发现这些子弹不是原装的，所以大队长叫韩连长把子弹退回去。昨天下午于林庭就是把子弹退给了郑部李营长，并把原交的款子拿了回来。这就是于林庭送子弹的实情。”

王得福埋怨地说：“刘副官，这样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刘保山解释说：“大队副，你外出办事不在家。这件事是匡大队长命韩连长办的，等大队长回来，你一问就明白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刘保山拿起话筒：“喂……哦……哦……”他扣上电话说：“匡大队长开完会回来了，请大队副马上去开会。”

这场由王得福、杨怀生精心策划的“于林庭盗卖子弹事件”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三)

送走王、杨和刘保山，我心里悬的这块石头暂时才落了地。我站在庙前的台阶上，正在活动疲乏的腰腿时，地下交通员江亮站在小店门口，向我说：“于班长，刚才我买了一条好鱼，请你过来喝酒。”

我一进店门，他就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八路军十三团和东海区独立大队共3000余人，在于得水团长和于克恭特委书记的率领下，东上抗日。明天拂晓就能到达汪疃西北——院上、院下村。他接着说：“如果郑维屏、王兴仁和丛镜月几个土顽司令联合起来，围攻我军，上级要你带领全班相机‘里应外合’，并策反士兵投降八路军……”

我高兴地表示：坚决按上级的指示完成任务。

下午，在连部召开的班以上干部会议上，韩宗信连长念了丛部司令部发的情况通报：“于得水扬言东上抗日，实际上是八路在西边被赵保原司令打得站不住脚，来东海区避难，也可说是来抢地盘。昨天郑、王、丛部已组成‘抗八联军’，共集中4000多兵力作后盾。先和于得水谈判，让

他们原路返回。如果谈判不成，就把联军部署在汪疃西北山区，把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围而歼之。”韩宗信挥舞着拳头说：“这次打八路，大队长命一连组成20个人的敢死队，要一连齐心协力地干一场。”

这时，一个便衣侦察员跑进来报告：“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院上、院下村，听村里出来的老百姓说，八路正在村里搭戏台，晚上唱‘文明戏’。”

参加会议的人一听这个消息，都吓得目瞪口呆。韩连长却冷笑着说：“司马懿的大兵来的好快啊！不过，我这里不是空城，管叫他八路有来无回。”他命我为敢死队队长。

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重用，但心里却暗暗地想：这是我搞“里应外合”和策反士兵投降八路军的好机会！

这时，又一个侦察员跑进连部，气喘吁吁地报告：“汪疃街上贴了不少欢迎八路军东上抗日的标语，还贴了一些告国民党丛部官兵书。”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惊恐万分！韩宗信装着沉着的样子一挥手说：“这是八路军收买人心，不管它，准备战斗。”

八路军进驻院上和院下村的第三天，由威海出动的200多日伪军，在东西石岭村烧杀抢掠，被八路军一个营打得落荒而逃！共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30多支。

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振奋了文、荣、威海区广大群众的拥军热情。人们纷纷抬着肥猪和鸡鸭鱼，到院上村慰问八路军，并上书挽留八路军在东海区抗战。

与此同时，郑维屏、王兴仁和丛镜月组成的4000多人的“抗八联军”，由于互相推诿，只纠集了1500多

人。他们在柏家庄、英武村和黄岚村拉开战线，扬言要跟八路军决一死战。

八路军把打鬼子的胜利消息印成小报，一夜之间贴到汪疃集和顽军所驻的村庄，把顽军官兵吓得恐慌不安。

再说，一连的敢死队集中在“关帝庙”，昼夜进行近战、夜战训练。在八路军打鬼子那天，大队长匡玉洲、王得福、韩宗信都到大庙看我指挥打夜战、打近战的训练。数九寒天，敢死队员都累得满头大汗，练得比实战毫不逊色！

匡、王和韩看完了演练，对我和敢死队员大加赞扬。我表示决不辜负长官对敢死队的期望，这次坚决打他个“腹内开花”。

东上的八路军在院上、院下村驻训的第八天晚上，又原路返回了，准备反“扫荡”。

就在八路军走了的下半夜，所谓“抗八联军”却一齐开到八路军所驻过村庄，又打枪，又扔手榴弹，还挨门挨户搜捕八路军的地下人员。一直闹腾到太阳出山时，第七大队的一、二连才唱着得胜歌，“凯旋”返回汪疃防地。

(四)

在1940年1月底，形势骤然突变，从西边不断传来鬼子要扫荡驻东海区国民党顽军的消息。在汪疃就能听到大炮响，紧接着驻海阳的秦毓堂部被鬼子扫荡垮了；还有驻牟平的顽军部队也被鬼子打垮了。从散兵中得知，有的散兵插了枪，换上了便衣，有的扛着大枪，还有空着手而逃的……一时，汪疃周围的村庄不是散兵派饭吃，就是散兵用枪支子弹换群众的衣服，入夜乱作一团。